

北海古窑址与海上丝绸之路

王 戈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陶瓷之路”或“海上丝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以丝绸为主，以陶瓷、茶叶等商品为次的海外贸易线路。到8世纪唐朝中叶，瓷器大量出口，到宋代，陶瓷已发展为与丝绸并列的出口商品，以致有中外学者称宋以后繁荣起来的中国海外贸易线路为“陶瓷之路”或“丝瓷之路”。在英语中，中国则成了陶瓷的代名词。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的一条文明大动脉，是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桥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轴。在它两端，产生了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条大动脉中，分别产生了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古代文明。

古窑址，是某一地区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的见证物之一。据初步调查统计，北海市（一区三区）至少有30多个古窑址。上至汉，下至清，时间跨度两千年。而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窑址只有9个，其中有上窑、下窑、东窑、西窑、大窑、英罗窑、草鞋村窑、红坎窑、豹狸窑等，有汉、唐、宋、元、明、清等年代的窑址。其中下窑列为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余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一批如中窑、晚姑娘窑、岭底缸瓦窑、常乐缸瓦窑等新窑址，是近几年发现的。

北海的古窑址，大多位于沿海边沿或江河边沿，水上运输方便，瓷土、燃料和釉料都较丰富。不同年代古窑址生产的陶瓷器，除国内销售外，也有一部分通过“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等地区。北海古窑生产的陶瓷器，已成为北海与国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一、秦汉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秦汉时期的古窑址，北海地区目前只发现草鞋村汉窑群遗址一处。

草鞋村汉窑群遗址位于合浦县环城镇廉南草鞋村西南约几百米处，紧靠西门江。该窑址发现于1989年，合浦县博物馆根据村民报告到现场考察时，发现有

数个馒头窑，有成十多个小型马蹄窑，在村旁的人工运河处，发现有较厚的汉瓦堆积层及红陶堆积层，发现有较多的汉砖、方格纹板瓦、公母瓦和陶瓷器皿等残件。发现的汉砖，有些有纹饰，汉瓦，朝天面有乳钉纹、背面有绳纹。1993年，合浦县将草鞋村汉窑群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12月，我曾同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铨一起到该遗址考察，见庄稼地上散满汉板瓦、汉砖等残件，见到数个未发掘的馒头窑和一个马蹄窑，还见到一段用汉砖砌建的下水道。我们采集了数块汉代的板瓦、筒瓦、汉砖及陶瓷片作标本。这些标本均为残件，有：

板瓦两块。一板瓦残片长约30厘米，厚约1厘米，板瓦中间隆起，瓦背有绳纹，胎灰白色，质地粗松。另一板瓦胎灰褐色，厚约0.8厘米，胎质较坚硬，瓦背有绳纹。

残筒瓦两块。两块残筒瓦一大一小，小者瓦头宽约11厘米。两块残筒瓦均有瓦头、子口，呈龟背状，瓦背印有直纹、斜条纹等几种纹饰，有些纹饰粗，有些纹饰细。

残汉砖两块。两块残汉砖均宽13.5厘米，厚2.5~3厘米，残汉砖的一面印有斜绳纹或方格纹，与合浦汉墓出土的汉墓砖相似。

陶片。有黑衣方格纹、细网纹的灰陶片和残陶罐多种。

从考察情况看，该处早期应是汉砖、汉瓦的古窑遗址。除烧汉砖瓦外，可能还烧陶罐等陶瓷器。

汉窑址尚未发掘，内含之物尚不是很清楚。散落成十个马蹄窑，也许是南北朝时期的窑址，不似汉窑。其他几个未发掘的馒头窑，也许比马蹄窑时代更晚。有纹饰的汉砖，应是汉墓砖。草鞋村汉窑群，始烧于汉，延烧至何代还有待发掘研究。

据《广西外贸志》载：“秦汉以前，今广西合浦沿海一带，已有私营的海外贸易。”官方对外贸易，合浦在西汉已开始，这在《汉书·地理志》早已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军队开凿灵渠，沟通湘江、漓江，连接长江和珠江水系，开辟了从中原沿湘江入漓江，经桂江、北流江、南流江抵合浦的军民两用水道，

该水道成为从中原通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的内河航道。从汉至唐的朝贡贸易，东南亚、西亚地区及罗马等国，大多也是沿着这条水道行走的。合浦港也是凭借这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对外贸易获得较快发展。这在《旧唐书·地理志》及《宋会要》等书中均有记载。

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王朝已在合浦设立海关，名合浦关。合浦关的职责是管理接待过境的中外商客，以及船只货物的关税征收。当时合浦已成为汉朝的“东南一大都会”，合浦港已成为国际口岸。合浦城郊留下数千座乃至上万座（很多年久湮没无法统计）汉墓，便是“东南一大都会”的历史诠释。在汉墓中，也遗存有很多琥珀、玛瑙、水晶等舶来品，说明合浦当时与外番交往的密切程度。

在“海上丝瓷之路”的商品交流中，有没有草鞋村汉窑生产的陶瓷或北海地区其他窑址生产的陶瓷呢？据 1965 年第 6 期《考古》刊登安志敏《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一文载，马来西亚柔佛州曾出土过许多几何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纹、曲尺纹、雷纹、编织纹、波浪纹等，陶片的制法、质地以及某些纹饰，均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印纹陶非常相似。越南的清化东山、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也发现过和柔佛州相类似的雷纹陶片。安志敏认为，这些陶片很可能是通过外贸手段输入的。

有几何纹饰的陶片，在北海地区除了在草鞋村汉窑群遗址有发现外，在地角岭炮台旁，以及在营盘镇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在西沙坡遗址，既采集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也采集有汉砖、汉陶壶、汉板瓦、汉筒瓦，还有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的印纹陶片，以及有唐、宋、明各朝代的陶瓷残器。

在北海地区，现查明，有新石器时代印纹陶的古遗址有几处，有丰富陶瓷陪葬的汉墓近万座（目前在汉墓保护区内有编号、有封土堆的汉墓约 1200 多座，但没封土堆的汉墓应更多。如 1987 年开建合浦四方岭汉墓区一段二级公路时，发掘了 240 多座汉墓，仅有 13 座有封土堆），而汉墓所需的陪葬陶瓷是不少的，如 1971 年冬，在合浦南郊望牛岭发掘的一座西汉木椁墓，出土陶器 37 件。1988 年底，在北海孙东发掘的两座砖室东汉墓，其中 1 号墓约用汉砖 2 万块，2 号墓

约用汉砖3万块。2001年7月，在合浦九头岭发掘的一座砖木合构墓，出土陶器43件。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当地生产的古陶瓷应是不不少的，古窑址也不应只有草鞋村汉窑群一个，这还有待今后的调查发现。陶瓷是较重和易碎的商品，陆路运输时间久、运费高，而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安全，费用也便宜。所以，“丝瓷之路”逐渐由陆路转入海路，而且日益兴盛。北海地区离东南亚国家较近，在合浦，又设有对外贸易的合浦关，所以，上文提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纹陶片，很有可能是北海地区古时候通过南海“海上丝瓷之路”传输过去的。

合浦史学家周家干先生在《揭开合浦乾体古港面纱》一文中说：“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汉代陶器，所有这些出土印纹陶瓷，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纹、彩釉是一样的。这即证实了汉代合浦与东南亚交通贸易的史实。”这一论点，又进一步证明，北海古窑址在秦汉时期，很有可能有印纹陶瓷通过“海上丝瓷之路”，输往马来西亚、爪哇等东南亚国家。

二、隋唐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隋唐时期的古窑址，目前只发现3处，即英罗窑群遗址、晚姑娘窑址、煲窑岭窑址。

英罗窑群遗址。位于山口镇英罗村东南约1公里处。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资料载，该窑在英罗水库岭脚下，南面以前是海，后来海岸线南移约1公里。据说，以前那里有72条窑，东起英罗圣堂，西至石头埠，中间连着后来建的英罗水库大坝。窑群还伸入水库150米。窑群在英罗水库周围最密集，既有馒头窑，也有龙窑，表土的陶瓷碎片约有2公里。陶瓷片多施青黄釉或黑釉，无纹饰。广西文物队以前鉴定其为唐窑，窑址上也有宋代器物。广西容县也有与英罗窑相似的窑址。在英罗水库大坝南北两侧，从北面的瓷片带到南面的废窑包，约有近千米。在大坝西南角，尚有两个馒头状废品窑包，窑包内径3米多，存有大量烧坏的瓷碗。这些废品瓷碗，火候未超过1100℃，硬度不高，吸水性强，胎质粗松。在窑群周围，散落很多唐代的碗、钵、煲、罐、筷子笼等一类日常生活用瓷的残器或碎片。近窑包处有较厚的废品堆积层。笔者曾两次到此，采集到一部分陶瓷标本，有：

(1)碗。有大口碗、小口碗和浅口碗等几种。碗足，有饼形足和壁形足两种。饼形足碗分两式：一是实心饼足，足径7.5厘米，大而平，胎质灰白色，较粗松，碗内施乳浊釉，碗外施釉不到底，碗底无釉，呈灰红色。二是平足底划有一圈螺旋划纹，碗内施豆青釉，釉色滋润肥厚，胎体厚重，灰白色，有些火候高，胎质坚硬，有些火候较低，胎质粗松。壁形足碗也分两式：一是口径15厘米，足径6.3厘米；二是口径18厘米，足径8.6厘米。均圆口斜直腹，壁形足。碗内施青黄色釉，灰白胎，碗外施釉不到底，釉色滋润肥厚。

(2)罐。有四耳罐，也有六耳罐。造型丰满浑圆，圆口直颈，六耳双绳系。有些火候高，有些火候低，胎质坚硬、粗松均有。有的施黑釉，胎色浅红；有的施青黄色釉，胎质灰白色。釉有垂流现象。有的罐内施青黄色釉，釉色滋润肥厚，器外无釉。器壁最厚处约2厘米，较薄处约1厘米。

英罗窑群是一处较大的唐代窑址，有可能延烧至宋，因在窑群中发现有龙窑和宋代瓷片。其生产日用陶瓷的数量及器形都较多，质量也较好。窑址以前靠近英罗港，运输方便。英罗窑群衰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海岸线南移，后来运输不便，或者是以后因战乱、管理不善等原因所致。

晚姑娘窑址。位于南康镇晚姑娘村东南方，在南康江西面，西背矮坡，坡上有丰富的陶土。只发现一个窑包。地上瓷器残片比较多。从瓷片看，有大口碗、四耳罐一类的日用器皿。器壁较厚重，有些胎质粗松，釉色黄绿，较肥厚润泽，多有开片。罐、碗等器物，外部均施釉不到底。器物和英罗窑群所产相似。在该窑采集的陶瓷标本有：

(1)大碗。碗形扁圆、阔口、平底，碗足有些呈饼形，有些无圈足。碗口直径约14厘米，碗高4.5厘米。碗底多有似“6”字划痕，碗内底均有四五个垫烧痕。

(2)四耳罐。椭圆形，侈口，肩有四扁桥耳，器形与英罗窑相似。

煲窑岭窑址。位于营盘镇婆围盐灶大队煲窑岭，约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广东文物工作队发现，在钦州市档案馆钦州地区文教卷有记载。该窑生产的日用陶瓷与英罗窑群、晚姑娘窑所产相似。该窑在南康江之西，近出海口处，距北面

的晚姑娘窑约有 3 公里，水上运输方便。

隋唐时期，北海上述三窑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着“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县志》《简明广东史》等书，均记载唐宋时期有陶瓷出口。据《合浦县志》载：“远在汉代，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出口。”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丝绸和铁器为主，阿拉伯商人很赞赏中国的瓷碗”。

(2)文献有记载，唐代合浦有商船开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随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曾有佛教徒从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记述。史念海引述义净著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说，唐代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经过狮子国（僧诃罗国）的则有明远、窥冲、义朗、慧琰、大乘灯、僧哲、无行诸人。明远、窥冲由交州首途，无行则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广州出海。他又引用《释慧日传》说：“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逝、狮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今印度）。”陈炎教授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线……这条航路把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货混装的，北海地区唐代窑址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随着航船销往南亚、非洲和欧洲的诸国。

(3)古陶瓷专家曾考证，唐后期中国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东、欧洲及东南亚等地，而北海唐代生产的青瓷与国外部分地区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李知宴，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一文中说：“在马来西亚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址，韩槐准（南洋考古学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韩先生还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文莱苏丹国等地发现黑瓷双耳尊和青釉双耳尊一件，在彭亨也发现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该文还说：“南亚地区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这是唐朝航船进入波斯的必经水道……是中国航船上货的中转站。这里留下的中国古代文物特别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该文还指出：“唐朝与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朗、伊拉

克、阿曼、叙利亚、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国家经济贸易人员往来很密切……中国陶瓷输入波斯的数量很可观。”在伊朗的席拉夫这个古代港口，1965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该文中还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东和欧洲的传播，“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东和欧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双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与北海英罗窑群等窑址生产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优势及设有海关等有利条件，陶瓷出口沿着“海上丝瓷之路”进行贸易的可能性较大。首先，陶瓷从合浦港沿着“海上丝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运费低等地缘优势。合浦港是岭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水路通达，比广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东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会舍近求远的。其次，汉唐时期设合浦关，便于管理外贸生意。合浦关代表国家接待进出的中外使节，管理过往的商旅，征收货物的关税。再次，唐代时期，国力强盛，朝廷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区的陶瓷，沿着南海“海上丝瓷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可能性较大。

(5)瓷窑生产规模大，只有外销才有出路。据《合浦县志》载：“唐贞观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当合浦、北海等地域。天宝元年（742年）廉州人口为13,029人。”从英罗窑群遗址、晚姑娘窑址及煲窑岭窑址来看，其生产规模较大，年生产陶瓷约有几十万件。当时廉州人口不多，当地解决不了销售问题，只有靠外销，才能消化得了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

此外，当时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产的陶瓷，远在南朝时，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江等上游地区生产的陶瓷了。据《广西外贸志》载：“南朝时，我国商业繁荣，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埠。合浦是东南亚各国朝贡的通道。藤县古龙乡中隆村生产的古陶器经北流河、南流江输合浦出口。”

三、宋元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宋元时期，北海的陶瓷业步入了兴盛期，不但窑口多，规模大，烧造技术、制作工艺以及产品质量均比以前进步。北海现已发现的宋元时期窑址有下窑、中窑、上窑、东窑、西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红坎窑等。

下窑。位于福成镇下窑村，故名。窑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称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窑村，南北长约 300 米，东西宽约 100 米。据合浦县文物调查，该窑群在江岸排列有 12 个窑包，每个窑包相距三五十米。现在较为明显看出的窑包有 5~8 个。窑群大多为藤蔓、草木所覆盖。在窑包周围，瓷片比比皆是，废品堆积层较厚。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瓮、碗、壶、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废品堆还有垫饼、匣钵、石槌、窑砖等窑具。瓷片有青、黄、灰、绿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较好，呈黄色或青黄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有些釉层较肥厚，有开片。

中窑。位于福成镇中窑村东北约 200 米处。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窑约 2 公里，距上窑约 4 公里处。1988 年 12 月，笔者与桂林市古陶瓷专家李铎到中窑村考察，首次发现该窑。因它在中窑村旁，与上下窑相对应，故名中窑。窑址附近多产陶土，废品堆积层较厚。见有龙窑和馒头窑的残迹。曾烧造过盆、碗、壶、钵、瓮、煲、擂盆、猪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还发现有大缸、牛头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砖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黄釉，牛头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较高，胎质坚硬。有些器物壁较厚。馒头窑是烧大缸、牛头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砖长 40 厘米，宽 16 厘米，厚约 10 厘米。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龙珍珠城，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 320.5 米，东西宽 233 米，周长 1107 米，城高 6 米，城基宽约 7.6 米，是需要大量城砖的。白龙珍珠城的城砖应是中窑烧造的。中窑距白龙珍珠城约 7.5 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窑村明代曾为集市，称中窑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后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畅而废弃。

上窑。位于福成镇上窑村东南方约 200 米处，在福成江的西侧。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窑包高约 15 米，东西长 56 米，南北宽 54 米。1957 年 7 月，经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1980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郑超雄先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仅剩窑床中部约 11 米长。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长 50 米，宽 1.6~1.8 米，窑壁残高 35~45 厘米，窑室斜度为 25 度。废品堆积厚达 1~3.5 米，其中以窑具垫托居多。

出土的遗物大多无纹饰，有小部分有海鸟纹、蜜蜂纹、缠枝纹、图案化了的云雷纹、水波纹等。修饰手法是用毛笔描绘朱红色。有些器物朱书“福”“寿”“长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计有瓮、钵、盆、灯、执壶、擂盆、篋筒、动物、饼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出土的陶瓷残器有些釉色细、光泽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较厚重，平底，腹部较深。有些口沿为子母口。还出土有三件陶瓷烟斗，一个壁薄、釉细的残破小酒杯。

红坎窑。位于福成镇社坛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边，紧靠红坎岭，故名。该窑是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封土高约7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13米，窑膛为灰色砖砌结构。整个窑包已为草木封盖，似馒头状。从窑包周围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钵、壶、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较高，胎质坚硬，釉色多为石灰质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东窑。位于营盘镇东窑村的东侧，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的村庄边缘地带。东窑村的東西两侧以前都是古河道。据群众反映，东窑以前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6座窑包遗存，龙窑的构架还清晰可见。烧造的产品有碗、盆、罐、壶、钵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黄等色。有些钵釉色滋润肥厚、胎质坚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划纹。

西窑。位于东窑之西。东西两窑隔有约200米宽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当地群众说，以前西窑也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8座窑包。窑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还有瓮、罐、钵等瓷片，产品胎质、釉色品种与东窑、上窑大体相同。

常乐缸瓦窑。位于常乐圩镇北约1.5公里的缸瓦窑村旁，南流江东侧。窑口面对江边。为1999年10月，笔者到该地考察时首次发现，因近常乐圩镇，故取名常乐缸瓦窑。该窑现存两条斜坡式龙窑。每条长约40米。一条已多年停烧被草木覆盖，陶瓷片满地皆是。另一条似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停烧约有20年。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产品火候高，多为厚重粗瓷，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烧造的器物有瓮、钵、盆、沙煲、猪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质粗

糙，含铁量高，呈褐色，胎质坚硬。古窑的东边有很多深坑，应该是以前取陶土时挖的。据一位老人说，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窑了。该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与红坎窑相似。

黄丽窝缸瓦窑。位于南康圩镇北约 6.5 公里的缸瓦窑村东南方，因该地属黄丽窝村所辖，权且取名黄丽窝缸瓦窑。为 2001 年 4 月 26 日，笔者与一同事到那里调查时发现。古窑已被青树翠蔓所覆盖，看来窑址规模较大，不止一个窑口。该窑以前离海边很近，后来海岸线逐渐外移，现离铁山港海面约 2 公里。该窑周围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计废品堆积层很厚。从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钵、壶、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质有些坚硬，有些粗松。磨钵、瓷盆与福成红坎窑相似。

关于上面几个窑的烧造年代，从上面几个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等情况看，当属同一时代的窑口。它们的烧造年代，大体上始烧于宋，延烧至明。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曾根据 1957 年 7 月广东省文物普查队采集的瓷片鉴定，认为上窑、下窑两处窑址的年代当属北宋。所以，这几个窑烧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应是没有问题的。1980 年 11 月，广西文物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发掘上窑，据合浦县博物馆文物登记材料称，发掘时，“在窑顶上拾到一个断了把的压槌，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经整理鉴定为明代窑址。”上窑烧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上窑只说是明代窑址或说成是明嘉靖的窑址，则未免过于片面了。

1961 年，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先生到合浦复查，认为上、下窑址的年代当属唐代。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广亿先生是广东著名的古陶瓷专家，见多识广、眼力可靠、著作颇丰，广东的窑址，他大都考察过；二是他鉴定为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依据。1998 年 12 月，笔者与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铎到上窑考察时，在上窑发掘出来的废品堆中采集到三种碗底，其中一种是平底饼足有褐彩的碗底，应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 年 5 月 14 日，笔者陪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南京博物院教授张浦生去合浦博物馆参观时，在库房的上窑标本处见到一只平底碗残底，张教授说这是唐代器物。1986 年 12 月，《考古》杂志刊登广西文物队郑超

雄先生执笔写的《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其中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记载，其状况是：“碗，1件，残。敞口、圆底，壁形足。高5.5厘米、口径13厘米、底4.5厘米。灰白胎。”从“圆底，壁形足”的特征看，应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据上面几点，笔者认为曾广亿先生说上窑是唐代窑址，是有一定道理的。上窑烧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发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为北宋或宋代，或许更准确些。其他中窑、东窑、西窑、下窑、红坎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等，这些窑址都未发掘过，其深层内涵还是未知数，但从其窑址周围的堆积层及散落的瓷片看，与上、下窑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烧造年限，大体上定为上限始烧于宋代，下限延烧至明代还是可以的。

当然，各个窑口由于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不同，其烧造年限还是有差异的。如福成江边呈南北走向的四个窑址：下窑处于福成江的下游，离白龙港口约6公里，窑址的生产规模最大；中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8公里，生产规模比下窑小；上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中窑小；红坎窑处于福成江的上游，离白龙港口约14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上窑小。据《合浦文史资料》第三辑“福成沿革”载，明朝以前，“海潮上涨，自白龙港口冲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达福成圩东北角十余里处，那里有条村庄名为‘水尾村’……顾名思义，‘水尾’就是海潮上涨之终点”。这条水尾村，就在红坎窑隔江的对面。也就是说，以前是有海水涨到红坎窑江边的。它的陶瓷运输，主要靠涨潮形成的水路，随着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线的下移，这几个瓷窑逐渐失去了水上运输线，也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沿着福成江而建的四个窑址，红坎窑在上游，失去水上运输线最早，因而生产时间短、生产规模小，上窑次之，中窑又次之。

北海地区宋元时期出现那么多瓷窑，每年产品至少过百万件，而当时北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单靠当地销售是不可能的。《合浦县志·人口》没有宋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属廉州路，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该路人口为11,686人”，“到了明永乐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县总人

口为 33,007 人”，“明嘉靖元年（1522 年）县境为人口 11,822 人”。由此可见，北海宋元时期，乃至延烧至明代的窑址，其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往内地销售，其成本及质量也敌不过江西瓷及广西容县瓷。这些窑址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下去，主要靠产品外贸出口。

《合浦县志·经济篇》曾记载：“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李志俭先生主编的《北海港史》一书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贸易。这样，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元代古瓷窑址，大都在沿海地带……古陶及其器物的发现，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并通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定》一书中说：“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有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扩大，而且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该书又指出：“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等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直接关系。”该书还提到，在广西，“宋代烧青白釉的还有桂平和北海 2 窑，桂平窑所烧器皿较多，北海窑只烧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冯先铭所指的北海窑，泛指宋代北海地区的上窑、下窑等窑址。在下窑，曾出土写有红色阿拉伯文的宋代执壶。这些执壶，很可能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

从上面几个事例，可推断宋元时期北海制瓷业的发达兴盛，与外贸出口有关。《宋史》《宋会要》等书也有记载，我国与大食（阿拉伯）等国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宋元时期，北海等沿海地区之所以瓷业兴盛，外贸兴旺，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1) 宋朝廷重视海外贸易。①专门在广州、泉州等大港口设立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在廉州，设有沿海巡检司，元朝开设市舶提举司，旧署在“州南十里中和坊”。“中和坊”可能位于廉州镇沿着西门江往南约 5 公里的九头庙一带。这些外贸管理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接送中外来往使者和商舶，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

②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和钦州如洪砦为与交趾（今越南）互市口岸，直至南宋灭亡，共200余年。这有利于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廉州港（即今北海港）已成为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十大港口之一。据《廉州府志》载：“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③朝廷派内侍等重要官员到国外开拓贸易。④授商以官，对招商有贡献的商人赐予一定的官职。

(2)禁止以金银与外国贸易，在以物换物的交易中提高了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据《宋史·食货志》载，到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样，金银钱币不再用于海外贸易，而瓷、漆、丝绸等成了海外贸易的主角。外销的陶瓷，主要来自民窑，这就大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民窑陶瓷业的发展。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南宋时广东已开始使用纸币，到元代市舶条件更为完备，市舶贸易普遍使用纸钞，元初即已印行“中统钞”。市舶贸易流通手段的进步，也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出口商品“仍以瓷器和丝绸为大宗”。

(3)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主要反映在船舶指南针的应用及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广东、福建的造船业当时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载，宋代商舶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可见当时造船技术已很发达，有的船甚至可载千人。宋代朱或的《萍洲可谈》、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书，都记载有罗盘的科学原理。航船根据罗盘、天象、景物等因素，可做科学的航海定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为陶瓷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交通安全保证。

(4)瓷窑烧造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对外贸易及制瓷业的发展。在宋代，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等政权，并多次南下用兵。据《元丰九域志》载，南宋时，有不少士民从中原往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迁移。在南迁士民中，也有不少有制瓷技艺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加入使南方制瓷业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如对瓷土开始注意选择、提炼和因材施教，在纹饰题材、制瓷种类、施釉颜色等方面都有所进步。在烧造技术方面，窑炉也从半倒焰式的馒头窑改为平焰式的龙窑。龙窑多以山坡或堆土倾斜建筑，窑长数

十米，形似长龙。其特点是升温、降温都快，生产周期短、产量大、成本低。同时，还用上了观察窑温的火照（试温标）。瓷窑烧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了瓷业和外贸的发展。

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一书，作者赵汝适列举了当时亚洲有15个地区或国家是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其中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南庇、麻逸、渤泥等国，即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以及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

陈炎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载：“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国丝绸、瓷器，连中国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也通过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由这条航路而传入欧洲。”该文还指出：“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最高潮……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的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也指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岸、北岸、南岸都发现有中国的瓷器。《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又指出，在“红河岸边的库赛尔也出土有宋代越窑青瓷、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南方地区的青白瓷”。北海宋元瓷窑生产的是“南方地区的青白瓷”，这些青白瓷，在通往东南亚、非洲等地的“海上丝瓷之路”贸易中，应占有相当的份额。

四、清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明清时期，除宋元时期延烧至明的上窑、中窑、下窑、东窑、西窑和黄丽窝缸瓦窑外，明代始烧的有岭底缸瓦窑、沙田大窑和北窑、豹狸缸瓦窑，清代始烧的有赤江窑、小江窑等。

岭底缸瓦窑。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靖海镇，岭底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缸瓦窑村的西侧。因该窑毗邻岭底村公所，权且称之为岭底缸瓦窑。窑址沿着海岸边分布，南北长几百米。该窑是笔者和桂林李铎于1998年12月考察时发现的。当时访问缸瓦窑村82岁的卢翁，他说以前这里有四条窑烧缸瓦，他小时候就已不生产了，

也许在民国前已停烧。经初步调查，发现该窑有三条龙窑的痕迹，废品堆积层较厚。龙窑长约30米，窑室宽约2米多。窑床依海岸边的山坡而建。在窑址南方，有一深水大塘，这应是以前取瓷土时挖深的。

该窑烧造的主要是日用陶瓷器，也有建筑陶瓷和宗教用瓷。日用瓷器有瓮、碗、钵、煲、坛、缸、杯、壶、瓶、盆、网坠、筒瓦等多种，大小器均有，瓷胎有厚有薄。

采集的部分残器标本有：

瓮。有大小多种。大瓮口径12厘米，圆口，短颈，宽背，弧腹，外施青黄色釉，施釉不到底。

钵。有大小几种。大钵口径约30厘米，外施釉不到底。矮钵高8厘米，口径约18厘米，子母口，施褐色釉。有些磨钵，钵内布满交叉刻痕。

檐口坛。外弧檐，弧腹，平底，内口径约11厘米，外口径约20厘米，外施青黄色釉，有盖。

碗。有几种类型。有些足底有一小乳突，施青黄色釉，有开片，釉色润泽光亮，碗内底有青花点，涩圈叠烧。有些碗内印有青花梵文。有的碗外壁也印有青花梵文，碗底乳突周围有一小圆圈，圈足直径6.5厘米，足跟不施釉。有的小碗小圈足，足跟平切，足墙和碗底不施釉，沙底。有的碗内外釉色润泽，呈青绿色，有开片，足跟两边斜削不施釉，圈足直径8厘米。

魂瓶。宗教瓷器作陪葬用。采集到的魂瓶高约16厘米，魂瓶盖如笠帽状，直径9厘米，顶有一圆形纽。圆纽周围在一直径5.5厘米的范围内塑有5朵莲瓣纹，施青黄色釉。

网坠。呈长方扁圆形，陶质，长6厘米，宽3.5厘米，厚1.5厘米，有两个系绳圆孔，圆孔直径1厘米。

壶。卷沿口，短颈，平腹，流与口沿平，施青黄色釉，釉色光亮润泽，口沿直径5.5厘米，外施釉不到底。有些壶较大，釉色夹有黑斑。

窑具。有垫饼、匣钵等。垫饼呈扁圆形，直径约10厘米，底面均有两小圈，厚约1.5~2厘米。

汉筒瓦头。采集到一件。该窑是不是在汉朝时烧过筒瓦，因该窑尚未发掘，只有一件孤证，未敢定论。

该窑紧靠海边，瓷土丰富，水上运输方便，从废品堆积层看，此窑规模较大，烧造时间较长。1999年5月15日，笔者在市文物所将该窑采集到的瓷片，拿给笔者的老师——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教授看。他说从魂瓶、壶等瓷片看，应是元代或明代的。碗的釉多泛青，有贴花，应是清代的。由此大体上可判断，该窑为明清窑址应是没有问题的。

上新大窑。位于沙田镇上新村公所北约1公里的大窑村内。据《合浦地名志》载，大窑村“未建村前，此地建有三座大窑烧砖瓦”，故名大窑村。上新大窑西北距永安城约2公里，西南距上新村公所约1公里。大窑遗址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有一大水塘。大水塘应是以前挖陶土时形成的。水塘周围有些古窑址，散落及堆积的瓦片较多。在水塘边也发现有缸瓦窑，所烧的有钵、瓶、壶之类日用器皿。散落的瓷片火候不高，釉质较差。

在上新大窑北面约4公里，还有一个窑址叫北窑，位于山口镇丹兜村公所东南方约1.5公里，据老人说，北窑与大窑所烧造的产品以及烧造年代基本相似。修筑永安城时，大窑和北窑均为该城烧砖瓦。据《珠乡风情录·永安古城遗址》载，永安古城于明代初兴建，“该城周长四百十一丈，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城壕周长五百丈”，于明成化和嘉靖年间曾重修。永安古城的修筑，需要的砖瓦量是巨大的。大窑和北窑与永安城距离几乎相等，约2公里，分别位于永安城的东南方和东北方，均为明代窑址。

赤江窑。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石头埠村公所西北约2.5公里的赤江，临近铁山港海湾，水上交通方便。赤江窑建于清咸丰(1851-1861)年间，同治(1862-1874)年间由吴正仁三兄弟建“白碎窑”，厂号为“义和祥”，生产钵、盆、煲、缸等日用瓷器，而以白碎为主，白钵最负盛名。清末，赤江增建了“伯公窑”和“中间窑”，工人发展到200多人，有六条窑口和一条碗窑，年产陶瓷20多万件。产品有煲、钵、盆、碗、碟、缸、杯、壶等多种。民国期间，仍有六七条窑烧造，并组建了“同益公司”。赤江盛产瓷土(高岭土)。赤江高岭土含铝量占22%~30%，

铝能耐高温。赤江窑除生产白钵外，生产的沙煲也很负盛名。耐高温达 220 摄氏度至 420 摄氏度。赤江窑的产品总的来说具有耐高温、抗击性强、没有毒素等特点，远销国内外。毛主席纪念堂的壁雕也选择用赤江的陶土制作。

豹狸缸瓦窑。明代窑址。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豹狸村公所缸瓦窑村的北面，距缸瓦窑村约 700 米。临近武利江边，顺江水直下约 4 公里，便到直通北海的南流江，水上运输方便。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罐、缸、钵、盆、壶、磨碎等日用陶瓷。据合浦县博物馆普查登记，该窑包高约 7 米，长约 60 米，为龙窑。窑址周围陶瓷残片很多。

小江窑。明清时期，属合浦县的小江窑（今属浦北县）规模较大，所烧瓷器质优价廉，远销国内外。据载，小江窑建于明崇祯（1628-1644）年间，由小江人到景德镇学艺回来后建造的。所烧瓷器洁白轻巧，能耐高温。直到清道光（1821-1851）年间，在小江“马路坡先后建成瓷窑八条：张屋窑、上信窑、中间窑、老窑、四柱窑、高窑、广仁窑、塘角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盆、壶、杯、花瓶等。青花瓷、五彩花瓶质量都很好。该窑的产品大多都是经北海港出口。据请来的江西师傅鉴定，该窑瓷器质量仅次于江西瓷器。北海市收藏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也收藏有小江窑多件陶瓷藏品。

明朝时，北海地区创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窑已有成十条，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 2 万件计，每年装烧 2 次，全年就烧造 40 万件。到清朝，北海地区还有两三个窑口生产，年产陶瓷也有几十万件之多。据《合浦县志·人口》载：明嘉靖元年（1522 年），合浦县境人口为 11822 人；崇祯三年（1630 年），合浦县境人口为 15467 人；清康熙七年（1668 年），合浦县境人口为 7048 人；道光八年（1828 年），全县人口为 26528 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明清时期陶瓷器生产若单在本地消费，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凭着地缘优势，北海地区的陶瓷产业，显然是要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的《陶瓷之路》一书指出，在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中国瓷，既有宋元时期的青瓷、青白瓷，也有青花瓷。青花瓷既有元朝的，也有明清时期的。

北海岭底缸瓦窑烧制的梵文青花碗，有与佛教信仰相维系的梵文纹饰。这种碗很有可能通过“海上丝瓷之路”销往泰国、印度或非洲其他佛教盛行的地区。

有文献记载，北海明清时期有瓷器销往海外。《合浦县·经济篇》载，于清代及民国年间，合浦生产的“缸、盆、钵、砂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写于清末的《北海杂录·商务》载：“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载镬、瓦器往星加坡。”瓦器，即陶瓷器。《北海口岸外贸志》也指出：“北海开埠后……当时合浦、北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如小江生产的瓷器，质优价廉，每年有大量经北海销往广州……及至新加坡等南洋地区。”除小江窑的产品经北海口岸外销外，钦州的泥兴陶也从北海口岸出口。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载：“钦州生产的质地精良的陶器……这种陶制品实在是如此精美，官员们已经先后把一些实物作为贡品奉送给帝国宫廷。”由于钦州泥兴陶十分精美，清代从北海口岸出口的钦州泥兴陶也不少。

1986年12月，《考古》杂志刊载《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认为上窑、下窑等窑址在明朝之所以“兴烧”，是“与合浦县白龙采珠场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即使到明代，上窑、下窑等窑址也有成十处，窑炉数十座，每年生产至少也有几十万件瓷器。而那时雷、廉两府所使用的珠民，据当时粤督林富统计，也是“共夫二千名”。两千珠民也用不了多少陶瓷，推动不了北海明代窑址的“兴烧”。

为何明清时期北海的古窑址还那么兴盛，“海上丝瓷之路”仍很通畅呢？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明清两代前期均国力强盛，中外贸易兴旺，为陶瓷业的发展和“海上丝瓷之路”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代前期永乐（1403-1404）年间，明王朝派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船队十分庞大，拥有60多艘可容2万人以上的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数达26万人，大大提高了明王朝的威望，加强了与西洋的沟通。据《北海口岸外贸志》载，那时“安南（今越南）、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等国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行贸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明嘉靖（1522-1566）年间，

廉州官府开辟了从冠头岭前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新兴府等地的不定期直达海上航线，当时冠头岭一带已是“南北皆澳海船舫焉”，是商舶云集之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七月，清廷平定台湾后，禁海及迁界取消，中外贸易又再度兴旺，据乾隆版《廉州府志，度廉州海道》载，那时的廉州“圣朝之威远播，薄海之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航海梯山源源而来，现在辐辏肩摩，实为边海第一繁庶之地”。商路的畅通，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畅通及制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2) 陶瓷烧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是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繁荣的原因之一。据《简明广东史》载：“明代，广东的陶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窑址遍及全省各地……嘉靖前多为青釉瓷器，属叠烧；嘉靖后，开始烧制青花瓷，改用匣钵单件烧，器形制作精巧。”在北海下窑和岭底缸瓦窑的残窑堆中，发现有匣钵等窑具。明中叶以后，由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船舶的吨位在增大，对外航线也在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北海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

(3) 民间贸易逐渐取代了朝贡式的官方贸易，北海税率相对较低。明中叶，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持续一千多年的朝贡式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即“易公贩而私贩”，有利于促进陶瓷等民间贸易的发展。此外，北海税率相对较低。咸丰八年（1858年），根据中英《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除丝、茶、鸦片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即只征税5%，但北海口岸的征税税率却低至4%，进出口综合税率仅为4.7%。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有特殊规定：“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但在北海，凡是外国商品运往内地，只交纳2.5%的子口税。北海口岸税率低，有利于外贸进出口，因而促进了北海制瓷业及“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虽然明清时期有段时间实行海禁，但在巨大的商贸利润驱动下，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和陶瓷仍非常盛行。

总之，北海古窑址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创烧期，隋唐时期的发展期，宋元时期的兴盛期，及明清时期的延烧期，长期汲取和蓄纳南北良工之精华，在学习、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

北海古窑址的发展，与“海上丝瓷之路”的开拓和对外开放密切相连。北海古窑址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优势，通过“海上丝瓷之路”，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北海口岸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传播北海的陶瓷、丝绸等物质文化，是国际口岸的标志，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海陶瓷文化历史悠久。经济交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北海古窑，为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海上丝瓷之路”的繁荣，曾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作者为北海市文物管理所文博馆员）